

# 阿拉伯民族的三大特点及其 对阿拉伯政治思潮的影响<sup>\*</sup>

## ——以民族与宗教关系为视角的考察

刘中民

**摘要** 宗教性、整体性、地方性构成了阿拉伯民族的三大特点,并对近代以来的阿拉伯政治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教性在伊斯兰改革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中都得到了体现。在伊斯兰改革主义中体现为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混合;在原教旨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中体现为以宗教认同否定民族认同,但两者的政治主张又有所不同。整体性构成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基础,强调民族认同高于宗教认同,对伊斯兰教既排斥限制,又加以整合与利用,构成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待伊斯兰教的典型特征。地方性特征构成了地方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基础,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以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基础,建构自身的民族认同,排斥和贬低泛宗教认同,并奉行反对政教合一的世俗主义主张。

**关键词** 阿拉伯民族 宗教性 整体性 地方性 政治思潮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12(2010)03-0010-17

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族多国”构成了阿拉伯民族的典型特征,其重要的外部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东地区的国家边界导致了领土与认同之间突出的不一致性,并且导致了国家认同、次国家认同和超国家认同之间的激烈竞争。”<sup>[1]</sup>在阿拉伯国家,超国家的泛阿拉伯民族认同、泛伊斯兰宗教认同一直对阿拉伯国家认同构成了严重困扰,国家主权规范(sovereignty norm)与超国家规范(suprastate norm)之间的矛盾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外交政策的两面性。阿拉伯国家一方面坚持捍卫各自的国家主权及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从阿拉伯—伊斯兰规范寻求其对外政策的合法性。<sup>[2]</sup>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除上述外部因素的重要影响外,其内部原因之一在于阿拉伯民族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受此影响产生的多元化政治思潮及其复杂关系的影响。

在阿拉伯世界,围绕阿拉伯人是否是一个民族一直存在争议。根据相关学者的总结,大致有四种观点:第一,认为世界上没有阿拉伯民族,只有伊斯兰民族。有观点认为,“阿拉伯人由部落主义过渡到伊斯兰主义,没有经历过作为与众不同的人民或民族阶段。”第二,阿拉伯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文化实体。有观点认为,“阿拉伯共同体是一个包括所有

---

<sup>\*</sup> 本文的课题来源: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08JJDGJW256);2008年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互动关系研究”(08ZS35);2008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转型研究”(08JZD0039)。本文同时得到2006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上海市“曙光计划”、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支持。

讲阿拉伯语诸民族的国际文化实体。……泛阿拉伯主义不能抹去这些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的特征和特点……”第三，阿拉伯人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民族，但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民族。有观点认为，“阿拉伯世界只是在短暂的历史时期组成了一个民族”，在其之前埃及等民族就已经存在。第四，多数阿拉伯学者认为阿拉伯人是一个民族，但他们在阿拉伯民族形成的时间上认识不一。有人认为阿拉伯民族在伊斯兰教产生前的蒙昧时期就已经形成；有人认为阿拉伯民族形成于伊斯兰教诞生后的一个世纪内；有人认为阿拉伯民族的形成时期是倭马亚王朝。<sup>[3]</sup>在笔者看来，以上分歧至少反映了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如何看待民族共同体与宗教共同体的关系。如第一类观点只承认伊斯兰民族而否认阿拉伯民族的存在，其背后反映的多是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宗教认同否定民族认同、以宗教共同体否定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倾向。

第二，如何看待阿拉伯民族的整体性与地方性的关系。第二类观点认为阿拉伯人仅仅是语言文化共同体，而非民族共同体，同时特别强调“阿拉伯语诸民族”的地方特征；第三类观点虽承认阿拉伯民族曾在历史上存在，但同时特别强调埃及等民族在阿拉伯化以前已经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

第三，如何看待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民族形成发展中的作用。如第四类观点虽承认阿拉伯民族的存在，但又体现为多种不同的观点，其核心分歧在于对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看法不同。强调阿拉伯民族形成于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具有一致性；强调阿拉伯民族形成于伊斯兰教产生之后的观点，或者反映的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以阿拉伯民族作为伊斯兰教创立者为荣的历史观，以及试图协调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的政治诉求；或者反映的是伊斯兰主义者所坚持以伊斯兰教产生为标志划分“蒙昧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历史观。也就是说，即使是都承认阿拉伯民族形成于伊斯兰教产生之后的观点，在其历史观以及政治诉求上，依然可能表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取向。

在笔者看来，上述分歧集中反映了阿拉伯思想界围绕阿拉伯民族属性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上的尖锐矛盾。有的观点侧重阿拉伯民族的整体性，有的观点侧重阿拉伯民族的地方性；在阿拉伯民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上，有的强调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统一，有的强调民族认同高于宗教认同，有的强调宗教认同高于民族认同。这种争议在近代以来的阿拉伯政治思潮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并突出体现为阿拉伯政治思潮围绕民族与宗教关系的多元化观点。本文认为，宗教性、整体性、地方性构成了阿拉伯民族的三大特点，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它们在近代以来的阿拉伯政治思潮中分别对应着伊斯兰主义（包括泛伊斯兰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三种典型政治思潮。它们留给当代阿拉伯国家的沉重政治遗产之一，就是在阿拉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宗教、民族、国家三种群体认同的巨大张力，并表现为在政治合法性、国家体制、意识形态、发展道路等领域的竞争态势。

### 一、阿拉伯民族的宗教性及其对阿拉伯政治思潮的影响

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的“蒙昧时期”，“阿拉伯人尚未从部落发展成民族”<sup>[4]</sup>。穆罕默德面对阶级矛盾激化、社会道德堕落、部落战争频繁、外部威胁严重的社会现状，创立了伊斯兰教，并创立了穆斯林公社——乌玛（Umma，宗教共同体、穆斯林公社，国内多译为民族，事实上并不准确，结束了阿拉伯半岛的分裂局面。在社会组织方面，“乌玛”构成了以

宗教社团为表现形式的民族组织乃至国家的雏形，它“既是汇聚的人群，又是国家”；<sup>[5]</sup>在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方面，“阿拉伯民族的政治、经济、信仰、意识、语言都深深打上了伊斯兰教的烙印”。<sup>[6]</sup>

由此可见，阿拉伯民族与伊斯兰教的产生几乎是一个合二为一的过程。一方面，伊斯兰教把“向来散漫的阿拉比亚团结起来，使他们成为一个坚强的民族”；<sup>[7]</sup>另一方面，通过阿拉伯民族的扩张和传教活动，伊斯兰教逐步演变成世界宗教，并使许多民族因皈依伊斯兰教而阿拉伯化，成为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伊斯兰教通过对民族狭隘性的扬弃，突破部落、种族、语言、地域等障碍的限制，发展成为世界宗教。但世界宗教的普世性并不能完全祛除不同地区宗教信众及其文化的民族性，因此在世界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上必然存在普世性与民族性的复杂关系。

在中世纪时期，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并无矛盾。在包括阿拉伯民族在内的穆斯林的群体认同中，“宗教忠诚与民族认同意识相结合，形成‘双重忠诚’观念：首先要忠于真主及穆斯林共同体（乌玛，Umma），其次才是忠于民族和国家。”<sup>[8]</sup>对真主的绝对信仰和对乌玛的忠诚，曾经是凝聚阿拉伯民族，继而团结所有穆斯林的认同纽带，并使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在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框架内得以统一。但是，当伊斯兰世界在近代因西方殖民统治而变得四分五裂，并最终因1923年凯末尔革命而使徒具象征意义的“乌玛”——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后，穆斯林世界便陷入了深刻的认同危机。由于阿拉伯民族处于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位，这种危机无疑更加深刻。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通过宗教复兴实现民族复兴构成了阿拉伯民族觉醒的典型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阿拉伯民族的宗教性，并突出表现为伊斯兰复兴的三种典型思潮——伊斯兰改革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它们对民族与宗教关系的认识显然都深受传统宗教认同的深刻影响，并不同于阿拉伯民族主义。

#### 1. 伊斯兰改革主义（现代主义）

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以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等穆斯林思想家为代表的伊斯兰改革主义，在民族与宗教关系的认识上具有典型的混合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对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尚未进行明确的区分与剥离，其典型特点“是企盼通过复兴信仰来达到民族的复兴。”<sup>[9]</sup>如阿富汗尼从最初反对民族主义到承认民族主义有利于阿拉伯民族复兴的转变；<sup>[10]</sup>主张“民族团结”与“伊斯兰团结”同样重要，倡导泛伊斯兰主义<sup>[11]</sup>。又如，里达一方面强调伊斯兰社团是由阿拉伯穆斯林组成的“乌玛”（不包括土耳其穆斯林），只有阿拉伯人才能肩负起“穆斯林统一”；<sup>[12]</sup>但另一方面，在阿拉伯复兴的最终归宿即建立政治组织方面，他又转向了实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sup>[13]</sup>由此可见，在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中，“阿拉伯主义是用伊斯兰的语言加以阐释的，而且与伊斯兰复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sup>[14]</sup>

伊斯兰改革主义构成了近代以来中东地区两大政治思潮——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共同的思想之源。一方面，它包含了具有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这种改革主义的遗产与阿拉伯东方、阿拉伯西方（北非）、印度次大陆的民族主义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sup>[15]</sup>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伊斯兰传统，进而为伊斯兰复兴主义提供了思想来源，如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对于后来泛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阿布杜强调捍卫伊斯兰教的正统性和纯洁性，里达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产生了深刻影响。

#### 2.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两位重要领导人哈桑·班纳、赛义德·库特布，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在如何看待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上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对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以回应民族主义的冲击与挑战，并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sup>[16]</sup>首先，以宗教认同否定民族认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不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而是对超越种族、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信仰共同体——乌玛的认同。其次，以真主主权抗拒国家主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追求之一就是“以伊斯兰教贬损和取代世俗民族主义，重建体现真主主权的伊斯兰国家，即“伊斯兰国家是国家统治必须与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保持一致的国家”。<sup>[17]</sup>最后，以伊斯兰化取代世俗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提出了“唯有伊斯兰能解决”的口号，强调“伊斯兰的全面性”，反对政治与宗教、法律与宗教、教育与宗教的二元分离，以回应世俗民族主义对传统伊斯兰的冲击和挑战。

### 3. 泛伊斯兰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最根本的观点是认为所有的穆斯林都属于一个“穆斯林民族”。原教旨主义在乌玛认同以及重建乌玛方面的努力与泛伊斯兰主义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并不能简单地等同。因为进入当代以后，泛伊斯兰主义更多地成为沙特等伊斯兰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成为官方伊斯兰的重要形式；而原教旨主义主要表现为以重建伊斯兰国家为目的政治反对派，构成民众伊斯兰的重要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泛伊斯兰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它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关系也各不相同。

第一，早期的泛伊斯兰主义。它是伊斯兰改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早期的泛伊斯兰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企望以共同的宗教感情为纽带加强全世界穆斯林的团结互助，结成广泛的反殖民主义统一战线。”<sup>[18]</sup>

第二，从奥斯曼帝国解体到二战结束前的泛伊斯兰主义。奥斯曼帝国晚期力图利用泛伊斯兰主义维系帝国的统治，其后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也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推行泛突厥主义。而凯末尔革命宣告了泛伊斯兰主义的破产。在此过程中，部分保守的思想家对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感到惋惜，如里达主张阿拉伯人应肩负起重建乌玛，实现“穆斯林统一”的历史使命；而更多的思想家主张“以泛阿拉伯团结来代替泛伊斯兰团结作为联系民众的纽带，以现代民族认同来代替传统的宗教认同”<sup>[19]</sup>，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影响。

第三，战后的泛伊斯兰主义。由于伊斯兰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民族主义的高涨，战后的伊斯兰主义已经不同于历史上以重建哈里发制度为目标的泛伊斯兰主义，而主要体现为加强伊斯兰国家间团结、互助与合作的泛伊斯兰主义。<sup>[20]</sup>在此过程中，沙特等国家扮演了重要角色，以泛伊斯兰主义抗衡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并通过1926年成立的世界穆斯林大会、1962年成立的伊斯兰世界联盟、1971年成立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广泛施加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sup>[21]</sup>从泛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看，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在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方面，泛伊斯兰主义仍然非常重视强调“穆斯林民族”的统一性，伊斯兰统一的思想也从未消失，但已不再直接谋求政治统一。其次，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泛伊斯兰主义在阿拉伯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地位不断上升。

## 二、阿拉伯民族的整体性及其对阿拉伯政治思潮的影响

阿拉伯民族整体性的形成是伴随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帝国扩张，通过对西亚北非诸民族群体的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而完成的。根据学者的详尽历史考察，阿拉伯人经过两个时期逐步发展为一个民族。第一，从穆罕默德创教到倭马亚王朝，是阿拉伯民族初步形成时期；第

二,阿拉伯民族同化和融合其他民族,并使阿拉伯民族扩大的时期。这一时期是指在阿拉伯民族形成后的二三百年来或者更长的时期内,从波斯湾到大西洋的诸多民族,大多通过自然同化或强制同化,逐渐和阿拉伯民族融合,进而“形成一个以阿拉伯语为母语,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新的阿拉伯民族。”<sup>[22]</sup>因此,有学者指出,“同一性”构成了阿拉伯民族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体现为共同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等。<sup>[23]</sup>因此,完全否认阿拉伯民族的整体性显然不符合历史现实。

事实上,阿拉伯民族所具有的共同语言、宗教、历史、文化和共同地域等共性特征,恰恰是19世纪下半叶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与社会土壤。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以主张推广使用阿拉伯语,复兴阿拉伯传统文化等为主要特征。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前,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成为以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并产生了阿布德·拉赫曼·卡瓦克比、康士坦丁·祖莱克、阿布德·拉赫曼·巴扎兹、萨提·胡斯里、米歇尔·阿弗拉克等一批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二战结束的当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宣告成立,成为战后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泛阿拉伯组织。在20世纪50~60年代,埃及等国家积极推动泛阿拉伯联合,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阿拉伯联合的形式,并对阿拉伯国家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何处理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一直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与实践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伊斯兰教既排斥限制,又加以整合与利用,构成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待伊斯兰教的典型特征。在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阿拉伯民族主义试图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在群体认同方面试图明确区分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并将民族认同作为阿拉伯民族统一的认同基础。如拉巴斯认为阿拉伯人的历史并非是伊斯兰教的历史,伊斯兰教实际上是阿拉伯人的民族宗教;<sup>[24]</sup>阿拉伊利把语言、利益、地理环境、血缘关系、历史和风俗作为民族构成的六个要素,而把宗教排除在民族的构成要素之外;<sup>[25]</sup>胡斯里认为民族最强有力、最有效的纽带是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历史,而血缘、经济生活、地域、宗教等并不是民族构成的主要因素;<sup>[26]</sup>都表达了以民族认同取代宗教认同的思想努力。

第二,在宗教与世俗的关系上,提出了宗教与政治分离的政治主张。如阿佐利主张建立独立的阿拉伯民族国家,确立宗教与世俗二元分离统治体制;<sup>[27]</sup>阿拉伊利主张宗教的社会功能应局限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并不应与民族主义相抵触。<sup>[28]</sup>

第三,协调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并使伊斯兰教能够服务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如祖莱克、巴扎兹、阿弗拉克等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都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并没有矛盾,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民族的信仰应该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础。<sup>[29]</sup>

第四,反对泛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统一”,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阿拉伯统一”。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关系作出最为系统论述的当数胡斯里。他提出了民族共同体优于和高于宗教共同体(乌玛)、阿拉伯统一优于和高于穆斯林统一等主张,并倡导以阿拉伯统一取代穆斯林统一。<sup>[30]</sup>

### 三、阿拉伯民族的地方性及其对阿拉伯政治思潮的影响

在中东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帝国,每个帝国都把越来越多的地方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但由于地方分裂主义和交通的迟滞,总是不断感到保持统一的困难。”<sup>[31]</sup>伊斯兰教的创立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尽管促进了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并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帝国的统一,但是远没有将阿拉伯世界的广大地区融合成为统一的政治实体。阿拉伯民族诸

地缘文化板块在阿拉伯帝国中后期以及奥斯曼帝国体制下,形成了地方分权和群雄割据的局面。进入近代后,西方殖民列强的入侵和瓜分,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使阿拉伯世界分化成阿拉伯半岛、“新月地带”、埃及-苏丹地区、马格里布地区等地缘文化板块。<sup>[32]</sup>

从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的相互影响来看,阿拉伯民族的部落主义传统以及地方性特点与伊斯兰教的教派斗争交互影响,加剧了阿拉伯民族的内部分裂,进而使地方性和差异性构成了阿拉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阿拉伯史专家希提看来,崇尚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构成了阿拉伯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伊斯兰教兴起后,它们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并“成为伊斯兰教各国分裂和灭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sup>[33]</sup>

首先,阿拉伯社会的传统部落特征构成了导致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教内部分裂的重要因素。在四大哈里发时期,围绕哈里发职位的斗争与南北阿拉伯人的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南北阿拉伯人围绕帝国领导权斗争以及分裂活动此起彼伏;在阿巴斯王朝时期,阿拉伯帝国的分裂以地方割据的形式表现得更加突出。据史料记载,阿巴斯王朝虽然延续了500年的时间,但是,还在这个帝国建立之初,便在“帝国的中心及其周围”,兴起“无数的王朝和准王朝”。<sup>[34]</sup>以战乱四起的马格里布地区为例,在8~16世纪涌现出的地方王朝就多达13个之多。<sup>[35]</sup>纵观阿拉伯世界约1400年的历史,其统一的时间仅有100年左右,而分裂的时间则长达近1300年。<sup>[36]</sup>

其次,伊斯兰教的教派矛盾作为阿拉伯民族内部分裂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民族的分裂。尽管《古兰经》不断以“统一”(21:92)、“不要自己分裂”(3:103)、“不要为正教而分别门户”(42:43)等教导其追随者,但伊斯兰教的分裂从穆罕默德逝世时便已经开始。历史表明,伊斯兰教教派的产生和统一的穆斯林公社的分裂,以及各教派的长期斗争,对阿拉伯民族的分裂产生了重要影响。“伊斯兰教的分裂和不同教派的长期对立显然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扩大了中东-阿拉伯社会结构的异质程度,阻碍了这一地区的人们向一个统一民族发展的进程。”<sup>[37]</sup>

阿拉伯民族的地方性特征与近代以来西方殖民统治的人为分割,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的进一步分裂,使得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及民族国家的建立具有典型的区域性特征,并且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应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基本上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前后,通过反对英、法、意等国在各地区的殖民统治得以完成的。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认同与泛民族认同、泛宗教认同的关系成为阿拉伯国家独立后面临的迫切政治任务。无论是独立前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在民族与宗教关系的问题上都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基础,建构自身的民族认同。如埃及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利法阿·塔赫塔维提出了埃及人为一个民族的论断;<sup>[38]</sup>艾哈迈德·卢特非·赛义德明确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sup>[39]</sup>陶菲格·哈基姆甚至否认埃及民族的阿拉伯属性。<sup>[40]</sup>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安东·萨阿德主张叙利亚属于叙利亚人,叙利亚民族的使命是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sup>[41]</sup>阿拉伯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在国家认同方面,也力图实现“基于共同认同的民族文化和‘公民神话’的发展”,各国高度重视发掘包括前伊斯兰时期在内的民族文化。如埃及、伊拉克十分重视对古代史的研究,并将大量古代符号(埃及的法老文明和伊拉克的巴比伦文明)运用于现实之中,旨在培养共同的民族认同。<sup>[42]</sup>

第二,排斥和贬低泛宗教认同。如埃及的塔赫塔维明确区分了宗教与民族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区别,主张民族优先于宗教;<sup>[43]</sup>卢特非强调埃及民族应“把对宗教的、伊斯兰的忠诚

转化为对祖国、国家和民族的忠诚”，<sup>[44]</sup>并对泛伊斯兰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陶菲格·哈基姆认为“埃及的民族存在独立于阿拉伯人、穆斯林、基督徒和整个世界”。<sup>[45]</sup>叙利亚的安东·萨阿德主张必须和泛宗教认同决裂，“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都不能以宗教为基础”。<sup>[46]</sup>

第三，强调世俗主义，反对政教合一。如埃及民族主义思想家塔哈·侯赛因明确主张宗教和政治分离，主张根据民族主义思想建立一个非宗教的政府，埃及的出路在于“民主的、世俗的改革方案”。<sup>[47]</sup>叙利亚的萨阿德更加明确地主张政教分离，严禁教士干预政治。<sup>[48]</sup>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阿拉伯民族的宗教性决定了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思潮均无法回避如何处理各自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这一历史性课题，形形色色的伊斯兰思潮均不同程度地倡导宗教复兴，并排斥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的整体性和地方性分别构成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基础，各种民族主义思潮虽强调与伊斯兰教的联系，但更侧重民族认同并排斥宗教认同。因此，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思潮在群体认同、国家建构、社会发展道路方面围绕如何处理宗教与民族的关系，形成了两大发展方向，一个方向是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等形式的伊斯兰复兴思想，另一个方向是包括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它们之间既存在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的一面，也存在相互排斥、矛盾斗争的一面，并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与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政治发展的层面看，突出表现为阿拉伯国家在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始终交织着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矛盾斗争；从国际关系层面看，突出表现为地方（国家）民族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复杂矛盾斗争。

#### 注释：

[1] Raymond Hinnebusch,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

[2] Korany, Bahgat, “The Dialectics of inter-Arab relations, 1967 – 1987”, in Abdullah Battah and Yehuda Lukas, eds,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Two Decades of Chang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8, p. 165.

[3] 杨灏城、朱克柔主编：《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4] 同上，第5页。

[5] [英] 弗朗西斯·鲁滨逊主编，安维华、钱雪梅译：《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6] 王素色：“阿拉伯民族的形成”，载《社会科学探索》1995年第12期，第69页。

[7] [美] 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1页。

[8] 吴云贵：“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4期，第3页。

[9] 吴云贵：《近代伊斯兰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10] 陈嘉厚主编：《现代伊斯兰主义》，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11] Sylvia G. Haim, ed,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pp. 14 – 15.

[12] Ibid, pp. 22 – 23.

[13] 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 – 255页。

[14] Basheer Nafi, *Nationalism vs Islam*,

<http://english.aljazeera.net/focus/arabunity/2008/02/200852519420197834.html>

[15] 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Politics*,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57.

[16] 刘中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思想挑战”，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

[17] Hugh Roberts, “Radical Islamism and the Dilemma of Algerian Nationalism: The Embattled Arians of

Algier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0, No. 2, April 1988, p. 557.

- [18] Sylvia G. Haim, ed.,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1964, p. 9.
- [19] 吴云贵、周楚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第307页。
- [20] 同上,第320~321页。
- [21]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199页。
- [22] 杨灏城:“阿拉伯民族的特性与阿拉伯国家与人民的合与分”,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
- [23] 王京烈:“论阿拉伯国家的合与分”,载《西亚非洲》1992年第4期。
- [24] Sylvia G. Haim, ed.,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p. 103.
- [25] *Ibid.*, pp. 120 - 121.
- [26] 彭树智:“论萨提·胡斯里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载《西亚非洲》1992年第2期,第31页。
- [27] Sylvia G. Haim, ed.,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pp. 81 - 82.
- [28]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页。
- [29] Sylvia G. Haim, ed.,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p. 167, p. 72, pp. 242 - 243.
- [30] 刘中民:“萨提·胡斯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1期。
- [31] [美] 乔治·E·柯克著,武汉大学翻译组译:《中东简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
- [32] 张明举:“中东—阿拉伯世界政治格局形成的历史根源”,载《西亚非洲》1986年第2期,第52~53页。
- [33] [美] 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第29页。
- [34] 同上,第579~580页。
- [35] 杨灏城:“阿拉伯民族的特性与阿拉伯国家与人民的合与分”,第21页。
- [36] 杨灏城、朱克柔主编:《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第40页。
- [37] 张明举:“中东—阿拉伯世界政治格局形成的历史根源”,载《西亚非洲》1986年第2期,第55页。
- [38] Sylvia G. Haim, ed.,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p. 68.
- [39] Albert Hourani, *Arab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London, 1962, p. 69.
- [40] Israel Gershoni and James P. Jankowski, *Egypt, Islam, and the Arabs, The Search for Egyptian Nationhood, 1900 - 193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99.
- [41] Bassam Tibi, *Arab Nationalism, A Critical Enquiry*, p. 168.
- [42] 黄民兴:“论20世纪中东国家的民族构建问题”,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9期,第16页。
- [43] Sylvia G. Haim, ed.,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p. 61.
- [44] 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Politics*,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64 - 65.
- [45] Israel Gershoni and James P. Jankowski, *Egypt, Islam, and the Arabs, The Search for Egyptian Nationhood, 1900 - 193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99.
- [46] Kamal H. Karpat,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pp. 89 - 90.
- [47] 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Politics*, p. 6.
- [48] Sylvia G. Haim, ed.,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p. 170.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09年12月